

法国当代中国学

[法]戴仁 主编 耿昇 译

CINQUANTE ANS D'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JEAN-PIERRE DRÈGE



172.

La Carrière commencent les Ouvriers descendant le Pékin à l'ouest des Montagnes pour le porter aux Pélons

法国当代中国学

[法]戴仁 主编 耿昇 译

CINQUANTE ANS D'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JEAN-PIERRE DRÈ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当代中国学 / (法)戴仁(Drege, Jean-Pierre)主编;耿昇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8

ISBN 7-5004-2246-6

I. 法… II. ①戴… ②耿… III. 汉学 - 研究 - 法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561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 数 490 千字
印 数 3 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ISBN 7-5004-2246-6 /K · 364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并得到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译者的话

《法国当代中国学》一书，经过多年酝酿和筹备，在各方面仁人志士的鼎力协助下，终于可以奉献在诸位热情读者的案头了。这一者可以飨中国学术界，二者可以实现法国汉学家朋友们希望让中国同行了解其科研成果的夙愿，三者也是译者这十多年来工作的一次小结。三全其美，人生难得之幸事也！欣慰之余，不禁还想在这部本来已冗长的译著之外，再赘言几句。

西方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已具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西方汉学的兴起，既是西方列强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向海外实行殖民扩张和寻找海外市场政策的直接结果，同时它又是多方位地为这一政策服务。换言之，西方国家中于16世纪之后兴起的三大东方学（中国学、印度学、亚述学），与殖民主义的崛起和发展是同步的。就中国学而言，它首先在当时南欧的几个航海大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应运而生，但很快就由法国人执西方中国学研究之牛耳了。在美日两强于本世纪后来者居上之前，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始终独领风骚。

18、19世纪之后，巴黎被誉为“西方汉学之都”。在西方甚至有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其实，追根溯源，日本的中国学最早也是受法国的影响和启发才发轫的。美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也有不少是受法国影响，或者是直接由法国人培养出来的。严格地说，19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汉学，主要是三个方面：纪实性

著作（游记、航海记、出使报告、经商报告、日记、札记、书简）、译注中国经典和著作（以四书、五经、史地和自然科学著作为主）、宏观介绍中国概况（或为殖民主义的经济、外交、政治、军事服务，或作为贵夫人们沙龙中高谈阔论的新鲜话题），尚谈不到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

西方真正经院式的中国学研究，应该是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年）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实际上是于1815年1月16日开课）而开始的。英国于1876年、荷兰于1875年、俄国于1851年、德国于1912年，才使中国学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的神圣殿堂。由此可见，法国在海外中国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成果浸透着严谨的法兰西人文主义精神，尤其是在法国中国学家的考据派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而易见。这大概与受整个拉丁语世界重视人文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有关。时至今日，虽然法国的中国学已不再有过去那种独霸一方和称雄于世的局面，甚至还可以说是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法国的中国学家们，其人文科学研究与盎格鲁—撒克逊派仍截然不同。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至今依然独树一帜，始终令全世界中国学界对之情有独钟，高度重视。

二战之后，由于美日两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学术界懂英、日语者较多，读法、德语者稀少，所以在中国学术界每当谈起海外中国学研究时，言必称美、日、英，能对法、德等国的中国学讲出个子丑寅卯的人，实实寥若晨星。要使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有一种全面的了解和正确评价，必须打破这种日美称霸的局面。

1994年，当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URA1063研究组（中国写本、碑铭和图像文献研究组）主任，与译者交往多年和关

系甚笃的老朋友戴仁 (Jean-Pierre Drège, 1946—) 先生来华访问时, 我们突发奇想, 欲向中国学术界宏观性地介绍法国自二战之后或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虽然我们将选题范围严格限定在“中国学研究”的范畴内, 但面对这样一项错综复杂的任务, 非但一个或几个中国学者难以胜任, 甚至也不是几个法国中国学家力所能及的。我们于是便决定, 邀请法国各学科、各单位的主要中国学家介绍各自学科与单位的中国学研究概况。当然, 这样分割一个科学整体并不能令人满意, 分兵把口, 文章分得太细, 一人一个领域, 难免会产生一种支离破碎之感, 而且又会造成重复、交叉和遗漏, 甚至还会令人产生“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印象, 容易使人只看到表面现象而难以揭示内在联系。这一切实在有点差强人意。但是, “有”对于“无”来说, 却永远是“无限大”(∞)。我们情愿将最成熟的果实留给未来更称职的专家们去摘取。我们本来就只抱有充当未来科学发展之铺路石的希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样做已经不容易了。

戴仁教授归国后, 便在繁忙的科研、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 为这项计划四处奔走, 游说“诸子百家”。当译者于 1994 年访法时, 我们又共同遍访巴黎中国学家中的名流。这些老朋友们也出于友情, 纷纷将自己的“名山事业”暂作搁置, 以大手笔而著小文章。这样又经过两年多, 才促成了今天奉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但名家又有名家的难处。由于我们邀请的都是各学科和各单位代表人物或最大权威, 所以他们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应在自己妙笔之下的生花文章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历来都以谦虚谨慎为美德的学子, 唯恐造成“自我吹嘘”之嫌。不以自诩为美。由此造成了对每个学科担纲人物的介绍明显不足。这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此外, 由于许多内容均属交叉学科, 故重复与交叉之处又频频出现, 甚至挂一漏万之处也屡见不鲜。每位学者都是根据本学科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命笔, 造成了体例很不统一, 甚至出现

了对同一个问题的评价竟大相径庭。这些都是不尽人意之处。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学术问题上本来就不能强求一致。本书倒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典型之作，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由于本书从筹备到出版，拖了四年多。法国学者们的约稿拖拖拉拉地陆续收齐，再加上缓慢的翻译、校对工作，故待到本书面世，许多信息资料已经成为历史，最新成果难以反映。不过，就我国学术和出版界的基本状况来看，甚至从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任何信息、动态、资料、观点、方法都是“历史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略显过时的，充其量也主要是对过去的总结而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不过，本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总结法国 50 年来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全书旨在评说“当代”，而无意于指点“当前”。这样想来，我们反而感到有点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

本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均是由戴仁先生在法国组织的未刊专稿，在中国国内首次出版。为了力求更加全面一些，译者又精心选择了几篇过去发表在法国各种学术刊物中的文章。由于个别选题的约稿未到，而在本文集中又绝不能付诸阙如，译者也只好越俎代庖，根据自己掌握的素材而草成“急救章”。特此说明。

本书的选题范围严格地限制在“中国学研究”的范畴内。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各抒己见。但凡是有意或无意攻击中国、搞政治宣传煽动、“冷战”性的书报文章，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机构和刊物，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者，一概与本书绝对绝缘，我们理所当然地应“鄙而远之”。对于法国出版的大量有关中国的通俗读物、纯文学作品、时事评论、影视节目、旅行导游、风景画册一类的著作，也概不予论及。本文集中所介绍的，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科领域。

每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但每种民族文化，也都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

会为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如它必然会从世界各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文化能否生存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不仅取决于它是否能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而且还取决于它是否能吸收一切有益的外来营养。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但历代炎黄子孙孜孜不倦地钻研，也吸引了外国学者。从国外中国学的发展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我们组织翻译这本文集的指导思想。

文化固然具有阶级性，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却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得更加强烈。中西文化间有撞击又有借鉴，有交流又有较量。我们经常听人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根本不了解，我们之间无法沟通和交流”，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聋子的对话”等。此话虽非空穴来风，却有很大偏颇。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辩正同一命题。要想互相沟通、交流和借鉴，首先必须互相理解。在我们责备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精髓到底又了解多少。不必过分苛求，如果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达到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所知程度，那么我们之间的交流、借鉴，甚至是较量，也就会容易得多了。我们应该承认，尽管西方那些真正的中国学家们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立场和世界观与我们不大相同，但他们大都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高度仰慕。他们为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了向世界介绍古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采取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奉献了毕生精力。其精神可嘉，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讲，惟有他们才是西方真正从深层次上了解中国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必要像商贾大亨们那样重利轻义，也不会像政界权贵们那样“打政治牌”。从宏观上讲，他们既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又是中国学者们的异国“知音”或“知己”。所以我们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介绍他们的中国研究成果。借“国外中国学”的它山之石，来补国内的“国

学”之玉，这一点大概可以形成共识吧。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中国的月亮也并不比外国的圆。“月是故乡圆”只是一种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而不是科学的事实。这一点大概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中外学者各有千秋，互有短长。科学无国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只能以水平高低来打分，而不应以国籍来划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学植根于华夏这块沃土，但其鲜花与果实却飘香于世界五大洲。我们应为中国学走向世界而感到自豪，也应对外国同行的成就表示衷心祝贺。这就是我们从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书生以文会友的“雄心壮志”了。

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汉学”（Sinologie）、“中国学”与“中国研究”（Etudes Chinoises）之间的异同。“汉学”只把中国研究的范围限制在中国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研究”又侧重于当代和现实问题。将中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都纳入到“中国学”中，可能较为恰当。法国学者对于蒙古、新疆、西藏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学研究中都占有很大分量。故斟酌再三，本书的标题仍定为《法国当代中国学》。但在法国学者们各自的文章中，涉及到中国中原地区和汉民族时，都称之为“汉学”，我们也姑且从之；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我们仍称之为“中国学”。无论如何，若将“蒙古学”、“藏学”、“突厥学”、“满学”等均称为“汉学”，总觉得有一点词不达意。但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很久，也很激烈，大概还会继续争论下去，本书无意下定论。遵从习惯，约定俗成，这样处理尚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汉学”只是“中国学”的一部分，而“中国学”又是“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

我还必须对本书的法国主编戴仁先生作一番简单介绍。戴仁（Jean-Pierre Drège, 1946— ）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挂帅人物。他的博士论文《1897—1949年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78年由法

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作为该所一套博士论文丛书《汉学研究所丛书》第5卷刊行。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96年出版中译本。他原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继苏远鸣（Michel Soymié, 1924— ）之后，出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历史和语文学系）的研究导师；又继梅弘理（Paul Magnin, 1939— ）之后，担任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共同组成的敦煌文献联合研究组的主任（该研究组现已更名为“中国写本、碑铭和图像文献研究组”，简称URA1063研究组）。他同时还与法兰西学院的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 1944— ）教授共同担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所长。戴仁先生本人是研究敦煌写本的专家，尤以对中国古代书籍史（印刷术、纸张、文字、装帧等）的研究为专长。他于1991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了《中国写本时代（10世纪之前）的文库》，于1986年主编了《远东和南亚的书籍与印刷术》的文集。此外，他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书。如《丝绸之路，风景与传说》（巴黎，1986年艺术文库出版社版）、《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巴黎，加利玛尔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台湾出版了中译本）等。至于他有关敦煌学，特别是有关中国印刷术史的著作，已不下数十篇。戴仁先生是译者的老朋友了，译者翻译过他的不少论文，也写文章介绍过他的学术成果。他经常来华作学术考察与交流。法国汉学界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由他主持的。

本书是在多方面的帮助下艰难问世的。那些慷慨赐稿的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们确实情义可嘉。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给了一笔为数不大的出版补贴。虽无济于大事，也可略补本书的巨资投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各级领导和责任编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媛女士无私奉献，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仔细审读译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所长以及刘梦溪、阎纯德、孟华、张西平、查雅华等师

友，均曾给予大力帮助。译者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从事法国汉学的翻译和介绍已有十七八个年头了，本书也是对译者这段时间工作的一项小结。本人从来以科学的态度行事，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别人的褒贬。学海泛舟，书山攀崖，有几个热心同行盯着自己，免得溺水坠崖，岂非人生一大快事哉！

耿 昇 识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夜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序 言

欧洲的汉学研究实际上发轫于从 16 世纪末起派遣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但却是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法国才出现了一种大学的教学课程。

1814 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一个“中国汉语、鞑靼语和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创立于 1795 年的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于 1843 年开设中文课程，以为翻译人员作职业准备。数年稍后，便创建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它相继设立了两个系，其中列入了高水平的教学，首先涉及到了历史学与语文学，其后是宗教学。1901 年，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创建使法国汉学家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当代中国文化了。法国于是便以一种特别强大的汉学潜力而进入了 20 世纪。诸如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年)、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年)、马伯乐 (Henri Maspero, 1883—1945 年) 和葛兰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年) 这样的天才人物，便是其明显的证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无疑标志着汉学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我们一方面会发现中国研究不仅在欧美数国中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而且投入汉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数目也获得了大量增加。我们尤其是目击到了研究领域的一种分裂和大部分汉学家更加明显的专业化现象。更明显地运用各个领域的专业化方法，诸如在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艺术史或科学史等领域中，从而招致他

们中的许多人都限制了其研究视野。在法国，我们应该指出，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年）保障了一次惹人注目的过渡，同时表现出了他在自己探讨过的大部分领域中的才干，尤其是在佛教和俗文学（话本）领域，同时又向最为错综复杂的研究开放。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 ）步其后尘，他也以一种全新的思想，致力于把综合著作与深入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不时地觉得，必须对有关中国的研究作一番总结了。法国汉学研究的这类总结已由人作过数次介绍了——从论述了法国汉学草创时期的考狄（Henri Cordier）或戴密微，直到苏远鸣（Michel Soyumié）先生。本著与这些研究不同，它主要涉及到近五十年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它不是出自惟一一位作家的作品，而是出自所论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的著作。

把汉学分割成不同学科，实际上是既提出了某些长处，又具有某些弊端。如果说它可以使人更广泛地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内行介绍的各种著作，但它却暴露出了遗忘或重复某些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危险。这可能就是人类学研究的情况，该学科的著作就跨越着诸如考古学、经济社会史或技术史。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我们认为最好是由一种对于法国有关汉学的主要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简短介绍来补充主题阐述。在此问题上也是一样，无法介绍所有机构。除了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之外，我们仅限于介绍纯粹是从事科研教学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可能会感到遗憾，本著中未提到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如巴黎第7大学，第8大学、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大学、波尔多大学或里昂大学。但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大家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大学之完整名录^①。

^① 请参阅阮桂雅：《法国大学、科研中心和研究组年鉴，1991—1992年》，载《法国文化交流会通讯》，1991年12月；裴天士：《法国的汉学、喜马拉雅学、蒙古学和藏学研究》，载《研究札记与文献》第4卷，当代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1992年版。

这部著作是以对某些哺育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几个大型文献资料库的介绍而告结束的。无论是指大学还是专题科研机构都一样。其中也会出现许多阙如，尤其是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社团或者是藏学研究方面更为如此。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主编选择的原因，数篇约稿却令人遗憾地未能按时交付。无论如何，本著必然会提供在法国完成的汉学研究及其丰富内容的一种概观。我特别要感谢本书中所辑录文章的作者，他们都友好地完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我也要感谢负责出版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及负责翻译全部文章的耿昇先生（郭丽英和林富士的文章部分是用中文写成的）。

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
中国写本、碑铭和图像文献
研究组（URA 1063）主任

戴 仁

（Jean-Pierre Drège）

1996 年 10 月于巴黎

目 录

译者的话	耿 昇 (1)
序言	[法] 戴 仁 (1)

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史

法国汉学研究史	[法] 戴密微 (1)
法国汉学 50 年	[法] 苏远鸣 (66)

法国当代中国学研究大师

法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	[法] 谢和耐 (105)
法国当代汉学大师谢和耐教授	[中] 耿 昇 (119)

法国对中国学各学科的研究

法国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	[法] 童 丕 蓝克利 (134)
法国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法] 裴天士 (147)
法国对 20 世纪中国史的研究	[法] 鲁 林 (151)
法国对 20 世纪之前中国史的研究	[法] 魏丕信 (168)
法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法] 毕仰高 (172)
法国对中国史研究的新前景	[法] 贾永吉 (178)

法国对中国儒教哲学史的研究……	[法] 汪德迈 程艾蓝	(183)
法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法] 朱利安	(190)
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	[法] 马克	(194)
法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法] 布尔努瓦	(201)
法国对中国考古和艺术史的研究……	[法] 毕梅雪	(221)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法] 戴仁	(238)
法国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	[法] 詹嘉玲	(256)
法国对中国道教的研究……	[中] 林富士	(269)
法国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	[法] 鄂法兰	(312)
法国对中国汉传佛教的研究……	[法] 郭丽英	(321)
法国对中国宗教的研究……	[法] 施博尔	(332)
法国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	[法] 艾乐桐	(339)
法国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法] 雷威安	(352)
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法] 居里安	(371)
法国对中国数学和天文学史的研究……	[法] 马若安	(376)
法国对中国传统生物学的研究……	[法] 梅泰理	(382)
法国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	[法] 塞尔日·弗朗吉尼	(387)
法国对中国西域史的研究…	[法] 罗伯尔·热拉—贝札尔	(391)
法国的突厥学研究……	[法] 路易·巴赞	(400)
法国的蒙古学研究……	[法] 鄂法兰	(419)
法国的藏学研究……	[中] 耿昇	(453)

法国各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中国学研究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法] 谢和耐	(493)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汉学研究		
……	[法] 贾永吉 叶利世夫	(499)
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		
……	[法] 阮桂雅	(509)